

# 《左传》宴会赋诗活动探微

◎ 李 柯

【摘 要】 赋诗是春秋时期宴享席上常有的活动，除了歌功颂德、把酒共欢外，更为突出地则是明颂者之志。这一活动不仅强化了诗歌参与政治的功能，扩大了诗歌的传播，尤为重要，散布其间的星星点点的诗歌评论为后来诗论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左传；宴会赋诗；赋诗活动；功用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6-0065-5

春秋诸国之间的会盟对象不断变更，从而使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活动也更加的频繁。在会盟期间，宴饮往往是必有的一个环节。故而，赋诗虽不能说每次宴饮席上都会有的活动，但大多数此类情况下还是有的。这些宴会赋诗，一方面由于它们大量引诗诵诗，从而促进了《诗》的传播；另一方面，又由于它们与政治活动直接挂钩，从而强化了其政治功能。而对诵者来讲，它们又起到言志之功效。不仅如此，《左传》中这种宴饮赋诗活动还蕴含了中国诗论的萌芽，为中国诗论朝更完善更系统方向的发展打好基础。

## 一、《左传》宴会赋诗活动之背景

春秋时期，赋诗活动常出现于诸侯会盟、公卿燕享等一些场合。这种赋诗事例，在古籍中，《左传》记载相对较多。此类赋诗活动频繁活跃于这些场合，尤其在宴享席上的这一现象，并非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的。

从历史原因方面来看，《左传》中宴会赋诗

活动对《诗》有一定的历史继承。《诗》之所以在春秋时期的各个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盛行，主要缘于《诗》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儒家对《诗》的新解。众所周知，《诗经》中已有大量的以宴享为题材的诗歌，像《小雅·鹿鸣》、《小雅·常棣》、《小雅·伐木》、《小雅·彤弓》、《小雅·南有嘉鱼》等。这些诗作虽然用于具体宴享的目的各不相同，与春秋时期宴饮席上赋诗的目的亦有差异，但它们在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譬如《小雅·鹿鸣》，天子大设宴席招待群臣嘉朋，为其奏妙音，使其饮美酒，让其领赐赏，都是为了使他们能进献佳计良策，正所谓“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可见，宴饮赋诗并非单纯的宴饮享乐，它还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的。《左传》中宴会赋诗的目的性就更为明显了。像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盛陈酒饌邀请奔走入秦的晋公子重耳入席时，子犯说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很明显，在推杯问盏且伴有丝竹之声的宴席上将展开一场不

〔作者简介〕李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8。

见硝烟的文辞大战。重耳先赋《河水》<sup>①</sup>，表示自己回到晋国要服从秦国的领导。秦穆公答赋《六月》<sup>②</sup>，期望重耳将来统治晋国，辅助周天子。此次享礼所用之诗与乐并非“两君相见之乐”，而是双方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政治需要和共同的政治目的选诗以赋，赋诗已转化为秦晋盟约的性质。另外，《诗经》中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的还是抒情言志之作。这些诗作在《左传》宴会席上之所以被大量吟诵，主要就在于它们与诵者内心产生了某种契合和共鸣，从而被吟诵者拿来浇己胸中之块垒。譬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诗·大雅·大明》为武王灭殷后所作之乐歌<sup>[1]</sup>，令尹子围赋之，业已越礼。又赋此诗首章，以文王自比，更显露了他欲吞并中原、统御诸侯的勃勃野心。《诗·小雅·小宛》是“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sup>[2]</sup>洞悉令尹子围心迹的赵孟则赋此诗之二章表明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借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暗指令尹子围昏聩无知，非“人之齐圣”之辈；借用“各敬尔仪，天命不又”警示他的野心不会得到天命之佑护，终将以失败告终。在这次飨宴中，令尹子围和赵武子所赋之诗与其心迹丝丝相扣，尤其是赵武子，不着痕迹中泼了令尹子围一盆冷水。除此之外，《左传》宴会中之所以大量赋诗，还缘于《诗》的由于比兴手法之运用而造就的隐约含蓄美和音乐节奏韵律美。《诗》中情之凸现几乎都是婉转而来，绝少直抒胸臆，这就为春秋宴饮烘托好了宴飨氛围，避免破坏宴饮之初衷。《诗》本来就是用来歌唱的，将其音乐旋律置于宴饮场合无疑增强了宴饮之娱悦气氛。由此可见，春秋宴饮赋诗对《诗》是有一定历史继承的。

从社会背景方面来看，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更是一个大国争霸的时期。这样的

社会大背景无疑要对诸侯会盟、公卿宴享这些场合上的赋诗活动产生一定影响。春秋诸大国为了赢取霸主地位，就需要拉拢诸小国，一方面以此巩固自身实力争取自己国家力量，另一方面则可借此切断对立国与之结盟的可能。然而，在无义战的春秋时期，结盟虽然被视为结盟之国交换诚信之行为，但背盟之事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巩固盟约的诚挚性和强化盟约的奏效性，各参盟国在宴享席上就要拿出结盟的诚意来。《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甯殖、郑公孙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晋侯这里说的“歌诗必类”就是所唱之诗须与舞相配，而尤重表达本人思想。<sup>[3]</sup>在该宴席上，就出现了一个歌诗不类的例子——高厚，故而荀偃怒说“诸侯有异志”。没有诚信，就没有盟约，尽管这种盟约的有效期谁也不敢保证，但对于结盟时就心存不轨者，落的下场只有“同讨不庭”。不难看出，《左传》宴会赋诗还是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一定影响的。

## 二、《左传》宴会赋诗活动之功用

《左传》宴会席上的赋诗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助兴宴席，而是另有其更为重要的功用。这个重要功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赋诗者个人而言，赋诗之功用就是言其心志；另一方面就诸侯国而言，赋诗之功用就是凸现在政治上。这样一来，宴会赋诗就担当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媒介工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sup>[4]</sup>可见，称诗言志是春秋时期的时代特色之一，通过

① 依杜预说：《河水》，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② 《晋语》韦注云：“《小雅·六月》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复文、武之业。其诗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其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此言重耳为君，必霸诸侯，以匡佐天子。”

赋诗,可以反映及观察人生志趣,以及个人和家国的风尚、前途。《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宋国华出使鲁国,鲁人摆宴招待,宴席上赋《蓼萧》对华定表示尊敬和欢迎,而华定听后瞠然不知所云,也没有答赋,鲁昭子就此断定他以后“必亡”。更能说明赋诗言志的便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垂陇之会。晋卿赵孟在参加郑伯宴会时,请陪坐的七位郑臣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公孙段各自赋诗以观其志。子展赋《诗·召南·草虫》,意在“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覿之,我心则降”句,以君子比赵孟,流露自己忧国而信晋的心声。伯有赋《诗·邶风·鶉之奔奔》,根据《诗序》,此诗为刺卫宣姜淫乱而作,故赵孟回以“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而伯有赋此之意,实际上是在“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所以赵孟退而又云“伯有将为戮矣”。子西赋《诗·小雅·黍苗》第四章“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于召伯,故赵孟以“寡君在,武何能”婉拒不受,而推功于晋君。子产赋《诗·小雅·隰桑》,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sup>[5]</sup>表达郑国君臣欲尽心供奉晋国之意。子大叔赋《诗·郑风·野有蔓草》,盖子大叔与赵孟乃初次谋面,于是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达相见之欢。印段赋《诗·唐风·蟋蟀》,取其“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明确自己心中的君子形象应该是瞿瞿然顾礼仪且能戒惧不荒,故赵孟听后赞之为“保家之主也”。公孙段赋《诗·小雅·桑扈》,取义君子有礼文,故能受天之佑、为邦之屏。以上是垂陇之会上七子由赋诗所传达出的心志。赵孟则通过赋诗过程中与七子的对话和悉心观察,然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伯有将为戮,因为诗以言志,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因为“在上不忘降”,故其后亡;印段则居子展之后,他能够“乐而不荒”,“后亡,不亦可乎”?赵孟得出这样结论的手头现有资料就是七子各人的赋诗,赋诗在此就起了媒介工具的作用,成为赋者心志之载

体。

宴饮赋诗除了言诵者之志外,它还有另一个重要功用,这就是参与政治的功能。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sup>[6]</sup>大国恃强凌弱,小国图谋自保,各国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变化万千,因而大小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很是频繁。在这种形势下,赋诗就被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会盟、宴享等政治外交活动所利用,从而使赋诗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由《左传》所记来看,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赋诗的典礼性为政治性所取代,赋诗的典礼性成为一种虚假的装饰。当赋诗被赋予政治性后,它便承当起诸侯各国往来的政治工具的使命。《左传·文公十三年》载:“冬,公入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芣》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这是一次完全以赋诗的形式进行的外交谈判,所赋之诗以救济难民、行役之苦和忧世之情及战乱伤离为内容,并非寻常诸侯相见之诗,宴飨通用之乐。而郑、鲁二国此次达成的协议,使郑、鲁、晋三国的关系也得以很大的改善。由此可见赋诗在政治上产生的威力。在此后的百年间,列国君卿在外交活动中的赋诗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即借助诗礼之风流,获取政治利益。

宴会赋诗在言志和政治载体两个主要功用的推动下,亦滋生出许多其他方面的小功用,譬如为了能在外交场合酬酢应对,表情达意,润色辞令,巧言动听,最终名利双收,赋诗就成了贵族和士子们必修的科目之一。这样一来,在不自觉中就提高了赋诗学习者的修养和学识。在官学开始下移的时代,这又不是为一种化民之良策。

### 三、《左传》赋诗活动之文学价值

《左传》中的宴会赋诗活动说其为明诵者之志也好,为政治服务亦罢,但有一点却是它最本质



的,这就是赋诗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活动。既然是一种文学活动,当然就具有一些文学特质,文学价值。笔者将其文学价值主要归纳为推动《诗》的流传和对后来诗论的启蒙两大方面。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所谓“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子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sup>[7]</sup>官守学业、私门无著述文字的条件下,贵族阶层独占文化特权并得以诵读《诗》、《书》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西周末年,周天子权力失落,“尊神”、“敬天”的思想也相应地发生动摇,从而使得社会文化层面也起了变化。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私学兴起,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还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提出,这些都对进一步促使“学在官府”垄断型文化专制制度的瓦解起到不能低估的作用。随着官学开始下移,那些本来仅属于贵族阶层拥有的文化特权,开始辐射更多的区域。《诗》作为文化典籍,是古时贵族阶层弟子必修的科目之一。它得以数千年流传不衰,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春秋卿大夫的那些饱含哲理的言论对话和充满智慧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左传》宴会赋诗活动对《诗》的流传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在《左传》中可以看到从国君、太子到卿大夫以及外交使臣,他们引《诗》赋《诗》盛况比比皆是。不仅如此,随着官学下移,私学兴起,用《诗》之风还深入宫闱闺阁,贵族女子亦可以赋之以表情达意。例如《左传·成公九年》记载鲁国季文子前往宋国探望成公之妹归来,成公设宴慰劳。席间,季文子赋《大雅·韩奕》之五章传达伯姬生活美满和谐的现状。成公之母闻之出房,赋《邶风·绿衣》卒章“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对季文子表达谢意。可谓摹情达意,恰到好处。不仅闺室女子能够引《诗》,蛮夷戎狄亦能侃侃引诵。襄公十四年,晋范宣子斥责戎子驹支背恩忘义,泄露机密,使得诸侯事晋不如以往,故而

打算逮捕他。驹支则先说戎人未泯晋之恩德且一直紧紧跟随,表其事晋之心不变;再述其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财礼不相往来,言语不达实际情况,无法“为恶”;后赋《小雅·青蝇》,劝谏宣子勿信谗言。《青蝇》诗今多认为是斥责谗人劝谏统治者勿信谗言之作,驹支在此用得极为得体,且获得了良好效果——“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春秋的宴会赋诗虽然只是《诗》之中的某些部分,但正是这些部分激起了人们学《诗》的欲望,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也就从一个方面加速了《诗》向整个社会的流传。

《左传》宴会赋诗活动还萌动许多诗论思想,为后代诗论体系地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传》中诗论萌芽思想含量最高的当属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的记载: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沍沍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一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

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食,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圣德之所同也。”

季札所观之乐,是诗、乐、舞三位合一的融合体,所以他对乐的评论,也是对诗的评论。“美哉”是他听完每首乐歌后的第一个直接感受,从而说明“美感”是诗歌所应具有的第一要素,这一点到后来演绎到对节奏、句式、押韵等诸多方面的要求,从而为诗歌走向美感开拓了更大的空间。除了给人感官之美外,季札还评论了《诗》之风格,《周南》、《召南》,他认为是“勤而不怨”;《邶》、《鄘》、《卫》,他则认为是“忧而不困”;《王》是“思而不惧”;《小雅》是“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在此评论中流露出一种温柔敦厚以理节情的气度,体现出对中和之美追求的趋向,即要求喜怒哀乐等内在情感的表现不可过分,过分则既有损于个体身心,也有损于社会稳定。这与孔子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理念是一致的。“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

者所以节乐。”<sup>[8]</sup>诗乐等文化艺术的价值在于用理性的尺度去建造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和谐大厦,既能陶冶性情,又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奠定了我国诗歌美学的传统审美观。季札不仅对诗歌外在美大加欣赏,而且尤为赞赏诗乐所歌的功德,亦即诗之内容。季札从音乐的内容来分析所反映的政治得失,强调了审乐、观诗可以知政的思想。如闻歌《周南》、《召南》,则曰“始基之矣”,闻《邶》、《鄘》、《卫》,则曰“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闻《王风》,以为“其周之东乎”,等等这些都十分具体地谈出了诗与政俗兴衰的关系:既是政俗的反映,又影响政俗的变化。季札这些对诗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些言论,甚至连诗论雏形都还算不上,但它的这些星星点点的言论对后来成体系诗论的形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左传》宴会赋诗活动在适应它生长的气候中蓬勃发展,成为春秋时期宴享会盟等一些场合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赋诗活动本身除了有目的的言志、服务政治外,又不自觉地推动了《诗》的传播,产生了一些后代诗论的萌芽,为后代诗歌攀越高峰奠定了理论基础。

#### 【参考文献】

- [1] 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 [5] 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8.
- [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章学诚撰, 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51.
- [8] 司马迁. 史记: 卷二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175.

(责任编辑 苏宁)